

这样，在当前的现代发展问题研究中，便面临着一个范型创新的课题。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和中国现代发展问题研究者来说，范型创新显得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第一，现存的范式假设跟中国社会经济的经验现象之间的冲突显得特别突出，人们亟需一种新的理解范畴（categories of understanding）来对这些经验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第二，中国本身是一个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1/5以上、面积跟欧洲差不多大的大国，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理应在新的范型形成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第三，中国自从80年代以来，正在经历着令人瞩目的现代化加速发展进程。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不同于现存种种“模式”的独特经验，将直接启发着人们在现代发展问题上产生新的认识，形成新的思路，从而有助于一个新的范型的成长。

至于如何发展一个新的范型，这当然不是短时间之内所能解决的。这篇短文的目的，也只是想在《范型危机》一文的基础上，把这个问题进一步明确提出来——这使得本文的内容与它的标题出入很大。但不管怎样，对中国史研究者来说，目前首先应该撇开旧的分析架构，在历史研究中尽量不受这种或那种“范型”的影响。就方法论而言，我比较赞同黄教授的主张，即应以微观社会研究（micro-social research）或区域研究（local studies）作为下手之处。我以为当前我们最亟需去做的，不是雄心勃勃地建构一个理论框架（这种没有基础的框架是很危险的），而是下功夫收集、整理第一手材料，扎扎实实地从事一番微观的经验研究。

（本文作者：李怀印，1964年生，现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商业化带来发展”的命题适用于英国吗？

——评黄宗智教授《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

崔之元

黄宗智教授的《中国研究的范式危机》一文，有许多发人深省之处。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在我看来，是黄教授挑明了如下事实：海内外治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四大流派，虽然研究之结论针锋相对，但却共同接受一个基本假定——商业化带来现代经济发展。故而，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论者以商业兴旺为证。而主张中国传统社会无力自发产生现代经济发展者，则试图说明商业“在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中仍是无足轻重。

黄教授的论文的精彩之处，即在于点破这一各家各派默契公认的假定：并指出这一假定目前面临着新近经验研究成果的挑战。具体来说，李文治、吴承明、黄宗智、Perkins和Rawski等学者的大量研究已经充分揭示出明、清中国的商业化已十分可观。但是，中国农业人均每日劳动生产率并未提高，反而下降。黄宗智教授将此现象称之为“内卷的商业化”（involutionary commercialization），并强调这一现象对“商业化带来发展”的假定构成了挑战。至于这一“内卷化”的原因，黄教

授认为是人口压力；但他指出，人口压力起作用的机制，并非马尔萨斯所谓固定的食物生产能力受到人口增长的挤压，而是瑞典人口学家Boserup所指出的另一机制，即人口增长促进深耕细作，减少休耕期，从而增长粮食总产量，但却造成农业劳力边际产出递减。简言之，“内卷化”的结果是“增长”（总产量）而无“发展”（人均每日劳动生产率）。

黄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农业的内卷化过程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逆转，其根源是乡镇工业的发展。这样，黄教授的研究揭示出中国80年代改革的深刻历史意义。既然我国过去“内卷化的”经验说明“商业化带来发展”的命题不成立，我们目前的改革也不应寄望于“彻底市场化”的奇迹。这是黄宗智教授的文章给我们的重大启示。

但是，依我之见，黄宗智教授对“商业化带来发展”命题的批评还不够彻底，因为他认为这一命题仍然适用于英国。他正确地将亚当·斯密的理论概括为“市场驱动的资本主义发展”：商业化促进专业分工、竞争和资本积累。他只是说斯密的理论不能解释中国内卷化的经验，却没有对斯密理论对英国本身的适用性提出任何疑问。相反，黄教授说，英国经验“给斯密的观点以强大的经验支持。”

我在这篇短评中，试图说明“商业化带来发展”的命题对英国也不适用。从而，为了摆脱“中国研究的范式危机”，我们需要更根本的理论重建。我的论证分三步。

首先，英国剑桥人口学派和法国年鉴学派的许多经验研究表明，“内卷化”是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中世纪农业的共同特征。Marc Bloch认为，“英国是大大早于任何欧陆王国的真正统一的国家”（Bloch, 1961, P.430），因为诺曼征服使英国有了统一的法律系统。公元10世纪诺曼征服英国后到13世纪末，英国人口增长了三倍，土地日益紧张，不得不“内部殖民”，开垦处女草地，深垦细作。M. M. Postan认为，“中世纪英国农民的集中种粮、牺牲养羊业的倾向，是13世纪经济地理的标志。”（Postan, p9. 552—6）他并指出这种精垦农业（intensive farming）导致边际生产率下降。David Levine更明确地指出，这种土地和人口之间的零和博弈（zero-sum game）是任何中世纪农业社会的特性，他将之命名为“内卷熵”（involutionary entropy），实与黄宗智教授的“内卷化”含义相同（Levine, 1987, P₁₃）。更有甚者，新近对美国麻省农业1780至1820年间演变的研究，也发现了“内卷化”的特征（Clark, 1990, P₂₁）。

由此可见，内卷化并非中国所独有。仅仅指出内卷化不足以打破“商业化带来发展”的命题。真正的问题是，内卷化在英国是如何被突破的？商业化是突破的要害吗？

第二，经验和理论研究均表明，商业化本身在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并不能带来分工专业化和发展。Postan的研究说明，13世纪伦敦和巴黎市场的扩大，不仅没有促进农奴制的解体，反而使之加深。他进一步指出，在近代世界粮食市场扩大的影响下，东欧的农奴封建制反而加强，与西欧封建制的瓦解形成对照（Brenner, P.25）。从理论上分析，商业化本身并不带来分工专业化和发展的事情，其实并不难理解。从封建主的角度讲，他可选择既不放弃封建榨取、又将农奴剩余产品出售市场，从而两全其美；从自耕农的角度讲，由于农产品市场受气候、需求等多因素的影响而波动过大，专业化生产风险大，从而是不理智的。这一点，从中国农民在20世纪80年代中还只是卖“余粮”给市场

的现象，可得到进一步的印证。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由于市场的不稳定，彻底的分工专业化，从个人角度看，并不是最佳的选择。正因为如此，不论法国年鉴派的Le Roy Ladurie，还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Robert Brenner，都认为封建农业是具有自我矫正机制的自动调节系统(Ladurie, P102)，商业化不足以冲破这一自调机制。

第三，英国突破诺曼征服以来农业内卷化的最初诱因，来自发生于1348年的黑死病。它使此后一世纪人口骤减，从14世纪初的500万人降到15世纪中的不足200万人。深耕农业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无法维持下去。在此条件下，封建主的最佳选择是将农地改为牧场，而使原农奴流离失所，这就是“圈地”。虽然圈地始于15世纪末，却在16世纪受到英国王室的极大抑制。这十分类似于明、清中国皇朝打击大户土地兼并、支持自耕农。在伊丽莎白和斯图加特王朝统治下，圈地得到控制，英国半自耕农得到发展，获得了类似中国半自耕农“永佃权”的“副本持有”(copyhold)和“有利租约”(beneficial lease)。但是，当1640至1660年英国内战中的激进派要求让半自耕农真正“耕者有其田”时，却受到大地主占主导的议会的拒绝。圈地和土地抵押市场在18世纪又得到发展，终于将英国的自耕农、半自耕农趋于消失。

由此可见，英国农业人口比重的下降，固然克服了内卷化，但却并非商业化的直接结果，而是许多自然、社会、政治的因素所凑成。值得注意的是，Robert Allen的最近研究成果表明，英国农业所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并未被工业所吸收，英国在1676至1831年间呈现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中“剩余劳动力”“不得转移的特征”(Allen, 1992, P251)只是通过19世纪的大量海外移民、殖民，英国资本主义大农场带来的过剩农业劳动问题才得到解决。更发人深思的是，O'Brien和Keyder两人对英、法两国1780至1914年经济发展的比较表明，法国农业、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并不比英国低(甚至更高)，尽管法国没有英国的资本主义大农业和大工业(O'Brien and Keyder, 1978)。

总之，英国经验本身亦不能用“商业化带来发展”来概括，它也经历了内卷化，商业化并未克服内卷化，资本主义大农场主经济并不见得是突破内卷化的最佳方式。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黄宗智教授关于中国研究的范式危机的文章，实际上要求我们对整个世界近代史有一个全新的考虑，从而对中国改革的目标做出慎重的选择。

参 考 文 献

- Postan, M.M., ed.,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1, 1966.
- Allen, Robert, *Enclosure and the Yeoman*, Oxford, 1992.
- Bloch, Marc, *Feudal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1.
- Brenner, Robert,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Past and Present*, 1976.
- Levine, David, *Reproducing Families*, Cambridge, 1987.
- Clark, Christopher, *The Roots of Rural Capitalism*, Cornell, 1990.
- P. O'Brien and C. Keyder, *Economic Growth in Britain and France, 1780-1914*, Allen and Unwies, 1987.
- Le Roy Ladurie, "A Reply to Robert Brenner", in *The Brenner Debate*, Cambridge, 1985.